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1, 2026, pp.83-94.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07>



梁启超对海国日本的理解及其维新知识分子身份的确立

陈绪石 (Chen Xushi)

摘要: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深受中国大陆农业文明影响，农耕是经济命脉，儒学是官学，因而日本不是海洋国家。不同于晚清的“中体西用”变革，明治维新开启日本的脱亚入欧历程，将中华文明圈内的日本改造为强大海洋国家。以日本精英为研究对象，梁启超思考明治维新为何能成功地促使日本转型为海洋强国，他对明治维新的感受、理解始终与他的变革大陆中国为海洋中国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梁启超以日本明治先贤为榜样，在思想启蒙、政治活动、文学改良等方面取得成就，他的维新知识分子身份确立。作为维新知识分子的梁启超在海洋学术文化的建构上取得重大成就。

关键词: 维新知识分子；海洋；梁启超；海洋国家

作者简介: 陈绪石，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海派文学、海洋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电子邮箱：chenxushi@nbu.edu.cn。

Title: Liang Qichao's Understanding of Japan as a Maritime Pow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Identity as a Reform-Minded Intellectual.

Abstract: Before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agrarian civilization of mainland China, where farming w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and Confucianism was the official school of learning, and thus Japan was not an ocean nation. Unlike the late Qing Dynasty's "Chinese Essence and Western Utility" change, the Meiji Restoration started the process of Japan's transition from Asia to Europe, transformed Japan within the circ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to a powerful maritime nation. Taking the Japanese elite as his object of study, Liang Qichao considered how the Meiji Restoration succeeded in transforming Japan into a maritime power,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has always been combined with his

ideal of transforming mainland China into a maritime China.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the Japanese Meiji sages, Liang Qichao's achievements in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activism, and literary improvement established his identity as an intellectual of the Restoration. As a Restoration intellectual, Liang Qichao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academic culture.

Keywords: Restoration Intellectuals; Japanese Influence; Liang Qichao; Ocean State

Author Biography: Chen Xushi,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Shanghai-style literature, maritime culture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chenxushi@edu.nbu.com.

1898年9月，梁启超逃离北京前往日本，直至1912年11月，他才回到中国。去国之日，梁启超为青年才俊，回国之日，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为什么有如此惊人的成就？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有言：“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217）。明治维新期间日本西学繁荣、国力日盛，在东亚近代文明史上，日本的话语权自此开始超越大清，“从《下关条约》到《凡尔赛条约》；日本占主动时期”（狭间直树13）。日本后来居上，皆因为比之大清国，它学习西方海国文化彻底、到位。在日本的梁启超眼界大开，开创改变近代中国的文化事业，因此，日本对他的影响须做深究。

梁启超深受近代日本文化的影响，国内外的许多学者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如焦润明有论文《梁启超的日本观》、夏晓红有论文《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狭间直树有著作《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郑匡民有著作《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等。后文的论述不同于已有的梁启超研究，论者以为，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已从封闭农耕国家转型为海洋商贸国家，不满足于近代中国革新迟滞的梁启超，将日本置于近代中国的海国转型背景下体察，在日本他看到中国的未来，或曰视日本为中国之将来，所以，他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发力以革新中国，从维新士大夫转变为维新知识分子。他维新的目标是影响并带领中国国民，将中国建设为强大海洋国家，所以，向国内传播域外前沿海洋学术，他最为勤奋。

一、中华农耕文明影响下的日本不是海洋国家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的大陆农耕文明是一种典型。古代文明形态，无疑与地理环境有重大关联，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里，按照地势划分文明类型，有高原山地、平原、滨海等三种，黑格尔的论析虽遭到中国部分学者的批评，但黑格尔的地理学说仍有屡试不爽之处，至少适用于人类早期的文明形态研究。华夏各王朝基本上是大陆国家，以经略大陆为主，所创造的农业文明在地理学上主要有三含义：一是中国处于东亚大陆，二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是重要经济活动，三是儒家文化是核心。由于定居在大陆从事农业耕作，儒家的和合中庸伦理和重义轻利价值观阻碍国民从事海外拓殖活动，东南沿海边民的海外冒险往往被朝廷漠视、压制，所以，中国古代文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安土重迁”为国民的文化心理。自中古以来，耕作、读书、考试、做官，是普通中国人的理想，朝代更替，生活方式不变。发达的中华农耕文明不仅在东亚大陆盛行，而且，它还深受周边一些国家的青睐，古代的日本、朝鲜和越南就在中华文明圈内。

与近代之前的明、清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也是一个闭关锁国、将自己圈禁在近代化进程之外的农耕国家。自 1603 年始，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将军-大名-武士构成统治阶级，在普通人阶层，农、工、商是一种等级制的存在，农民高出一等，因为农业耕作是立国之本。“德川时代的生产方式，是小规模地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农业是封建社会的支柱，庞大的武士等级是靠征收农民的年贡米维持寄生生活”（伊文成、马家骏 37）。岛国日本的经济不是开放型的，特权阶层主要依靠农民的进贡而生活，无意向外拓展。坚守农耕、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必然促成文化心理的封闭、保守。“17 世纪到 19 世纪，中日两国能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其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在中国清朝统治者的眼里，对外贸易不过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恩赐。……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日本也有类似的思想”（王晓秋 6）。近代之前的日本与古代中国的类似点太多，这绝不是偶然，也不仅仅是上层巩固统治使然，主因当是它们不需要开国，农耕经济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江户末期的幕府没有主动开国的欲求，所以，日本是近代文明之外太平洋上的锁闭农业国家。

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明显迹象是，统治者在日本宣扬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推崇君权，这有利于农耕经济活动，也为上层乐见。“幕府统治者感到，为了维持封建统治，单凭武力镇压是不够的，必须控制人们的思想，需要一种维持身分等级制的御用学说，强迫臣民有忠于主君的‘忠义’和绝对服从，而儒家思想就适应了这个需要，被幕府采纳作为控制人民，反对革新的精神工具”（伊文成、马家骏 169）。儒学在日本被定为官学，这是幕府统治、也是农耕经济活动的需要，简而言之，儒学宣扬是吻合幕府统治、农业耕作的行为。德川幕府借鉴中华农业文明，大力推广儒学，反映了日本为中华文明所卵翼，因此，从本质上讲日本就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该状况一直持续到幕府末期。

因此，虽然是岛国，但在近代以前，日本却是深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国家，不是海洋国家。有的学者受西方文化地理学影响，论析岛国的特征，指出：“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就必须向外发展。在西方，英国人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地区。在亚洲，日本就成了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史仲文、胡晓林 5）。日本成为发达国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情，而且，在此之前，日本是一个锁闭的封建制国家，向心力弱小。这说明，地理学视域下的海岛并不必然产生一种固定文化形态，也很难说它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地球上有人类居住的海岛很多，但像英日一样成为大国、强国的却不多，岛国最终成为哪种类型的国家，主要取决于周边轴心文明对它的塑造。大英帝国之所以成为海上帝国，因为它发展了北欧海盗精神和古希腊的海洋文明，工业革命又将其转化为现代海洋国家；虽然孟德斯鸠说，海岛上的人比大陆上的人拥有更多的自由，理由是海洋将海岛与大陆帝国隔开，“专制扩展不到那里”（孟德斯鸠 185），但古代日本深受中华农业文明影响，所以，它是专制的“大陆国家”，与大英帝国的相似度很小。

二、明治维新与海洋国家日本的强势崛起

近代日本和大清王朝，面对西方海洋文明的撞击，维新是共有的时代主题，但二者的进程差异很大。中国雄踞东亚大陆，日本是地处太平洋的海岛国家，二者的新变过程不同，日本很快展露了海国特质，而本应为海陆合一国家的中国，其海洋性迟至甲午海战期间仍无充分体现。日本学者指出：“同治中兴却并不打算实行全面西欧化和近代化。改革的中心意图是，以旧秩序下的意识形态—

—儒教——来维持旧的秩序，改革所希冀的西欧化和近代化就是为了维持旧的秩序，并在此限度之内，引进西欧的技术和武器。同治中兴的经济政策仍然是‘农本’和‘病商’（蔑视商业）。同治中兴虽然为了西欧化和近代化而尊重西欧国家秩序下的条约体制，但它同时又企图继续维持和亚洲各国之间的朝贡体制”（信夫清三郎 7）。因此，同治年间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核心所发起的洋务运动，是一次面向海洋的极其有限的运动。首先，洋务运动期间的工商业是自然农业的补充，工商立国主张未显；其次，建立在农耕活动基础上的儒家道统得以维持；最后，君主专制得到巩固，这种适合古代中国农耕经济的制度因为洋务运动而有喘息之机；至于坚船利炮等西方科技的引进，目的在于维护原有大陆农业文明下的秩序。这场起源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直至甲午战争期间，仍是对原有大陆农业文明的小修补；明治维新则用了约三十年时间，日本基本被改造为海洋国家，日本转型后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大清国不是偶然，而是文明、实力所致。

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出现了一场基于民族危机而发起的倒幕府运动。幕府时期的日本以农耕为本、闭关锁国，所以，欧美国家亦强行闯关，1853 年，美俄进入日本，日本被迫开国，并与西方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德川幕府统治日本 200 多年，本已被很多有实力的大名外藩敌视，再加上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因此，拥护天皇的倒幕派势力日渐强大，最终幕府垮台。倒幕府的意义在于：一是日本成为统一的国家，二是在民族危机中日本人有了共识，这为日本演变为民族国家创造条件，三是中央集权的日本将开启一系列改革措施。由此不难发现中日维新在起点上有重大差别：晚清洋务运动目的在于振兴王朝，确保农业文明和皇权制持续；而日本则推到幕府，志在建立近代国家，开始着手全面维新。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确立在旧时代结束基础上，是新时代的开始，而中国的同光中兴仅为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局部改良，农业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君主专制依然如故。

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进行了全面变革。就日本向何处去，日本高层在政权稳定后派遣了一个赴欧美考察的使团，“1871 年 11 月 20 日，新政府决定派遣由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参议）、大久保利通（大藏卿）、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芳（外务少辅）4 人为特命全权副使，由政府各省（即各部）分别选派的理事官，以及书记官和随员等，共 48 人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伊文成、马家骏 389）。西方的发达、先进震惊日本使团，也坚定了这些在后来决定日本命运的高官学习欧美的决心。他们对日本的改造彻底，除了天皇和政府大力加强海军建设、促使军队近代化之外，近代日本还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引进先进科技、扶持私人资本；由于认识到日本的落后与国民的不开化有关，所以，政府和思想家们乐此不疲地兴办近代学校和吸纳西方启蒙思想，以提升日本国民素质，以上述说明，明治维新不单是科技革新，而是系统的社会变革。启蒙的下一步是行宪，“所谓‘立宪绝对主义’，从绝对主义方面来看，它是一种否定‘赤裸裸专制’，依靠‘立宪主义’并通过‘立宪主义’来约束自己的绝对主义，是打算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成革命课题，以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专制主义”（信夫清三郎 415）。日本终于在 1889 年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在 1890 年召开国会，一个近代日本国家建立。与日本的快捷反应不同，中国真正的近代启蒙始于甲午战争之后，不幸的是，历史已不给大清朝时间，即使有时间，大清王朝也不会全面改良，大清的变革与日本明治维新反差强烈，一个新日本形成，大清王朝垂垂老矣。

明治维新促成海洋国家日本强势崛起。向海洋国家的转变就是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的一个转机”（小谷哲男 41）。维新不仅仅是转机，日本的转型切实存在，日本从封闭的农耕国家演变为海洋国家。首先，儒家道统被西方启蒙主义、重商主义所取代。脱亚入欧

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它大力引进各类西学，儒家学说不再是官学，启蒙成为大潮。海洋商贸与大陆农耕是差异大的文明，与古代中国以及维新之前日本的重农抑商大不同，向海上扩张的日本在近代构建海上谋利观念，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其次，在建构新学统方面，日本也竭尽所能，譬如，《海国图志》曾在中国遭受冷遇，日本人犹如久旱喜逢甘霖。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感受真切，“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梁启超 324）。日本人最善于接受海洋方面的新知识，除了《海国图志》外，《海权论》也先在日本出版，它们是日本国家权力朝海上发展的指导书。最后，在政统方面，近代日本推到幕府统治，打造立宪的天皇专制制度，它不同于西方民主制，这是一种国家专制政体，但行宪反映日本走出关键一步。因此，明治维新的实质就是将中华文明圈内的日本改造为海洋国家，由于维新期间的日本精英志在将日本建设为富强并与“万国对峙”的国家，日本实则逐渐成为海洋强国，因为“万国对峙”，就是在海上。当时的日本人对自身的看法较为低调，1903年，《外交报》转译日本《太阳报》上的论文，文内提到：“扼太平洋之权势与利益者，美为最强，英俄德次之，法与中国又次之，而日本则列于第二第三之间，其余不足观矣”（佚名3）。被日人小看的日本竟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中，完胜沙俄，实现海洋实力的成功晋级，进入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梯队。1934年，美国记者在《纽约时报》刊文：日本与英美在海上角力，成鼎立之势，英国是老牌海洋帝国，美国是新海洋霸主，亚洲强国日本也已崛起，三国举行海军会议，协商、对话以避免在海上竞争中出现武力冲突。中国译者在该文加了评语，“三大海权国开始海军竞筑，各各准备在一九三五年海军会议里面，用实力做后盾，从事作讨价还价的磋商”（历樵 1）。明治维新结硕果，日本是英美都不敢小觑的强国。

日本为什么能在短短三十年里崛起为海洋强国？一是日本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善于向他国学习的国家。不似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创造了惊艳世界的古老文明，在太平洋海岛的日本则未有闻名世界的文化，学习他人是其特长，因此，近代日本的西化比中国彻底，而大陆帝国则因为拖着厚实传统前进，故而步履沉重。二是日本是岛国，本来就有向海洋拓展的潜质。在古代的东亚，由于中华文明为大陆农业文明，而且中华帝国极为强大，所以，日本无法展露海国特征。西方海洋文明的扩张和中华农业文明的停滞为日本的发展带来契机，岛国日本终于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最后，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权力结构有助于一批大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涌现，他们为日本设计了改革方案，并实践之。中国的君主专制并不利于社会革新，大清国的李鸿章虽身为高官，实为“裱糊匠”，难有施展大才大志的机会，所以，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511）。日本的情形不同于中国，在幕府之外，外藩也很有实力，在倒幕府过程中，一大批影响国家命运的精英如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木户孝允、福泽谕吉等脱颖而出，他们力促日本全面革新。譬如，大久保利通在出使美欧之后，“决心以英国等为‘典范’，积极贯彻‘殖产兴业’的方针，走发展工商业致富治国的道路”（伊文成、马家骏 393）。果然，后来的大久保利通政府力推殖产兴业政策。真所谓时代不负日本社会精英，他们也推动日本走向海洋，力助国家崛起。

三、梁启超对海洋国家日本的感觉和理解

梁启超带着对大清王朝的失望和愤懑于 1898 年抵达日本，其时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由于他已经通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对日本有所了解，所以，日本在他心目中形象良好。梁启超虽然处在中国变革的前沿，然而，晚清向海洋国家转型的步伐过于缓慢，他在《变法通议》批判，“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梁启超 14）。梁启超所论已经涉及海权，应该说，此时的他并未阅读《海权论》，而只是根据近代中国实战败北的情形，他总结这一教训。与晚清的慢速相比，日本却是行驶在快车道上，“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疣。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这是梁启超在《去国行》里所讲述的日本，其中不乏褒扬的成分，但梁启超又是真诚的，“跨出了因熟悉而漠然的农业世界，惊奇于近代化历程中的日本及其被日本介绍的西方文化”（李怡 159），日本的成功转型梁已有所闻，一旦踏上日本国土，他的感受更为具体、深刻，也很复杂，而且他努力地去发现日本的成功经验，并向国内转达之。

就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意义，梁启超的观感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方面，其中也包括他对海洋文化的体会上，他赞赏日本所展现的海洋性特征。“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梁启超 324）。梁启超仿若进入一个新世界，因为日本引进的西学，不限于军事和科技，广求知识、开民智、强国基是他在日本所获得的日本第一感受，与近代中国有选择性的翻译不同，日本真有百川归海的度量。梁启超不仅仅在看日本，还透过日本窗口看西方世界，1900 年他写有《伟人讷耳逊轶事》。“其人栖息于海上者三十五年，中间经大小百二十四回之战斗，而赫然为世界历史之一大人物者也。”英国从海洋强国跃升为海上帝国，纳尔逊居功至伟，梁启超领略、讴歌英国的海上人物，欣赏的是西方人在海上的经营。在梁启超看来，日本也有其不足，尤其在国民教育上。“即如我日本之大学，谓摹仿文明，成效卓著，但自其表面观之则然尔；至于里面，其腐败有不可胜言者。当局者一依德国主义，其所以为教者，则以服从政府为之精神也。遂使全国少年，缺独立自重之气，成卑污劣下之俗。夫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书坑儒之术者，其祸更惨于秦政十倍乎”（梁启超 356）。上面这段话来自日本思想家陆羯南，他与梁启超对谈日本的教育问题，梁认为陆羯南所言属实。但日本的教育思想其实驳杂，有重个人独立的自由主义也有崇尚集体的国家主义，在教育方面梁启超倾向个体的精神独立，所以，那时的他不赞同日本政府的国家主义教育。总体而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不再是锁闭的农业国家，在走向海洋过程中，呈现开放气度，梁启超甚至将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这表明他高度认同海洋国家日本。

从梁启超在日本所写的文章看，他以维新期间的日本精英为研究对象，思考明治维新为何能成功地促使日本转型为海洋国家。尽管梁启超在《变法通议》里早就思索过日本问题，但终究隔了一层，到了日本之后，他有切实体验，研究条件具备。在《破坏主义》，他说：“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国论纷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坏主义，又名突飞主义，务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梁启超 349）。写文章的时候梁启超看好“破坏主义”，并以为破旧是新时代开始的必然手段，梁启超对日本的理解准确，倒幕府、告别农耕社会确实是日本维新取得胜利的基础。梁启超对维新期间日本精英的不同作为各有解读，但有一个共同主题，各路精英责无旁贷地引

领日本转型为海洋国家。在《自由书》，梁启超以为，日本维新之首要功勋为吉田松阴，而他恰恰是一位失败的人物，他的成功在于敢为人先，在西方海洋国家入侵日本时勇于面对现实，并学习西方。虽然被幕府处死，但是，他培育了一大批敢担当、有能力的学生，在倒幕府时，“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梁启超 337）。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梁启超指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治理非常成功，这有赖于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赴西方海洋强国取得真经。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他褒扬福泽谕吉，“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梁启超 559）。其理论如脱亚入欧说是日本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从本质上讲，脱亚就是摆脱中华农业文明之影响，入欧就是在坚持日本独立性的基础上引入欧美海洋文明并加入欧美国家队列中。在《自信力》一文，他赞颂日本政治家，“伊藤、大隈，铁路之办法不知，铁路之经费不知，公债之性质不知，买人之情态不知，何其陋也。不知而贸然倡办之，贸然订借之，何其卤莽也。虽然，使待其一知之然后办之，则京滨铁路，恐无成之一日”（梁启超 350）。有担当、重实干是他们的政治品格。在《记日本一政党领袖之言》，他记述，政党领袖口述日本政党政治、立宪政治如何经过艰难的争取而获得实质性突破。破旧之后是立新，维新之成功，在于一批批的志士在不同领域领导日本国民，这是梁启超在日本获得的真切感受和深刻领会。

梁启超有关于明治维新的体验、理解始终与他的变大陆中国为海洋国家即维新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即梁的日本领悟基于近代中国向海国转型的现实需要。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前驱，对保守的大陆中国而言，出于应对航海大时代之需求，他主张中国全面革新、走出农业文明时代，以达成推进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目标。梁启超因为不得志而亡命新兴海洋强国日本，他的日本感受和体会会有一个兴趣点即中国需要，正所谓：“梁启超作为 19、20 世纪之交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言论家，如何在明治思潮当中汲取他所需要的养分，配合中国的政治状况、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形成他自己的独特看法，为中国寻找世纪的出路”（周佳荣 69）。汲取日本的思想如此，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也是在为中国的变革觅寻突破口。梁启超时时不忘将他理解的日本当作中国变革的参照，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一文，他提出希望，“夫日本维新之始，赖伊藤数人之西游，则中土拨乱之才，安知不出于东土之学校，以保我种族，保我国家”（梁启超 323）。在西方海洋国家四处拓殖之时，若谋求民族不沦亡，梁启超以为，将日本打造为海洋国家的明治先贤堪为中华民族自救中的国人须效仿的模范。又如，日本政党政治在明治维新期间的发展经历过一段艰苦时期，日本宪政的实行离不开党人百折不挠地与新生专制的抗争，他因此而联想到近代中国人在国外创立的政党，“以若斯脆弱之政府，吾党犹不能动其毫发，吾党尚何颜以语国事耶，使吾党处于日本政党初立时之地位，将若何也？虽然，能力以相搏而后炼成，使吾党处于日本政党初立时之地位，则吾党之能力，或将有进乎，吾未能决之”（梁启超 394）。日本精英在维新政治上的作为，在他看来，对国人有着借鉴意义。

四、梁启超维新知识分子身份的确立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促使日本转型为强大海洋国家，日本的成功变革诱惑梁启超，居日期间，基于中国维新的需要，他认真体会并深入理解明治维新。下文论述，受日本维新的影响，他借鉴日本维新志士的行事方式并从中吸纳能量，完成多种角色诸如政治家、学者、作家等的建构，变身为维新知识分子。近代东亚的维新，含义丰富，本文取从大陆国家转型为海洋国家之义，维新知识分子则是从事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的实践，以推进近代中国向海洋国家转型的知识人。

首先，在日本的梁启超，迅速确立政治家身份，多次参与海外的维新政治活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还不是政治家级别人物，在日本，他结交不少政治党人，如曾有一次著文《记日本一政党领袖之言》，“会日本某政党领袖某君于某所，扣以政党初立时之情形，所言有深足令我辈感动者，归而记之”（梁启超 392）。日本政治人物的品格促使梁启超成长为耀眼的政治家。梁启超在海外参与和主持的政治活动甚多，在早期，梁启超尚未主导，1907年，梁启超多次与蒋观云、徐佛苏讨论组党问题，10月17日，政闻社于东京成立。在政闻社机关报《政论》上梁启超撰文阐述该社的政治主张：“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丁文江、赵丰田 419-420）。梁组党的目的是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综观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他在日本的表现活跃、抢眼，夏晓虹说：“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其在野比在朝时影响更大、更深远”（10）。这句话主要指向在日本的梁启超，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到保皇、立宪，梁启超的表现非常活跃。

其次，在政治维新驱使下，梁启超被日本热闹的西学引进和积极的思想启蒙所影响，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结合中国问题向国内传播新学，他因而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维新思想家。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这可被视作他在国内主办的《时务报》之延续，况且，随着对日本社会认识的加深，他的办报理念也在提升。在《论学日本文之益》里他说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广泛引进西学，作为有识之士，他会思考如何向国内传播西方文化。梁启超在总结《清议报》百期时以为，它具有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梁启超 478）等特色，所谓的倡民权、衍哲理即有目的地向国内推广西方思想、学术，启蒙国人，这表明梁办报刊已逐渐具有日本风格。在1902年新办的《新民丛报》，梁的启蒙思想家身份更为突出，“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此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丁文江、赵丰田 272）。梁启超所办报刊在风格上类似于日本维新报刊，这无疑属于借鉴。而且，在输入的思想方面，梁启超向国内传播的西学是日本人接受的西学，一学者以为：“由于梁启超是在日本的土地上通过日本人的译著或著作来了解西方的，所以梁启超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是一种被‘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想，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受到了‘日本化’的西方思想的影响”（郑国民 2）。近代中国的启蒙带有日本色彩，这是史实。在著名的启蒙者中，黄遵宪是最早的一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梁来到日本，“康有为的东学知识相当有限”（桑兵 2020：114），梁启超则远远地超过康有为和黄遵宪。第一，他不倦地借助东学而学习西学，第二，他向国内不遗余力地传播西学如海权理论、海洋人文地理学、太平洋时代学说等，第三，他所传输的西学大多基于中国的转型需要，第四，在思想输入时他有所发挥，第五，他创建了影响力大的新文体。所以，他是有重要地位的维新思想家，既有知识创新，在知识的播撒中又着眼于中国的改造，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属于梁启超的文化改良时代。

梁启超在日本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中国近代维新派文人。在

《夏威夷游记》，海洋要素驱使梁启超建构诗界、文界革命理论，海洋要素包括太平洋航行途中得来的冒险精神和西方航海家不断拓殖的业绩，开拓诗国新大陆的含义是以新语句书写新意境，意在以文学实现维新。后来他更看好小说，“于日本维新之运动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梁启超 359）。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在 1902 年创办《新小说》杂志，宣扬小说界革命，称欲新民必新小说。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理论被公认是中国现代文论的起点，不同于古典文论的农耕文明特质，梁启超的文论与海洋密切相关。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开了现代文学不好的先河，即在文学上他一度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不仅在文学理论文章里大力倡导文学的维新功能，而且也践行自己的文学观，诗歌、小说、散文的写作无不服务于他的政治维新目的。梁启超是维新派文人，维新派与文人，他首先还是维新派，但梁启超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文人，晚清维新是“五四”的先声。

以上所论表明，在日本旅居多年的梁启超深受明治维新期间知识精英的影响，志在变革国家，从事维新活动，建构新学术，维新知识分子身份得以确立。在中国的维新上，南方人独占鳌头，尤其是广东人表现突出，“从文明的角度理解，无疑是南方新崛起的海洋秩序向北方的农耕——游牧秩序的挑战”（许纪霖 2018：119）。一是南方本来就有一个海洋文化小传统，二是中华农耕文明不敌外来海洋文明，三是他们零距离感受日本的转型并获得能量，所以，南方崛起。黄遵宪、康有为虽为维新派，却是士大夫，是皇权君臣模式下的有限改革者，其变法维新的幅度小；梁的思想虽有反复，他一度主张开明专制，但这只是一次游移而已，作为政治家，他的基本倾向是君主立宪和共和，他最终是共和的支持者、帝制的反对者。因此，梁启超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意识”（许纪霖 2010：74），却也是摆脱了大陆农耕文化束缚的政治家，出于国家维新和国民启蒙的需要，他办报、从事教育、提倡文学界革命。他从海国日本获得启发，对这一点，日本学者在其编著的序言里指出：“梁启超的超人般的活动，固然缘于他个人的才干与素质，但更为重要的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创造了使其成为可能的条件”（狭间直树 7）。梁启超设想中的中国维新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在日本他吸纳西学、从儒家士大夫圈脱离，在多个领域发力，因而梁启超是一个维新知识分子。一是不局限于东亚大陆，面向海洋；二是他的各种维新活动以新学为基础；三是他从事学术文化上的创新事业以推动中国向海洋国家转型；四是在身心上他不再依附，而是具有独立性。一学者指出：“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黄敏兰 112）。该观点较为可靠，学者也从多方面对其观点做了有价值的论证，本文则试图以海洋及其文明为视角阐释梁启超身份的转变。

儒士梁启超在身份上演变为维新知识分子，归根究底，近代中国向海洋国家的转型是身份转变的契机。晚清王朝被迫将海洋视为发展的方向，知识人的变革时代到来。在大陆农耕文明遭到西方海洋文明的严重冲击下，知识人将目光投往海洋，自魏源、徐继畲始，海洋与国家发展前景问题被提出，“维新”就像东方一抹欲出的“曙光”，但知识人的认知难以突飞猛进，未意识到海洋是国家的重要地理、具有重大价值。梁启超勇立潮头，转变身份是顺势而为的作为。在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梁启超身上并不存在“历史与价值的背逆”和“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汪晖 13），在多篇文章如《20 世纪太平洋歌》《新大陆游记》《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梁启超以为古代中国是大陆国家，在感情上对这一传统没有依恋，他向往并认同的是海洋国家，这份执念促使他为国家的转型而建构学术。这表明，维新知识分子必定出现在从陆国向海国转型的近代，具备鲜明海洋特质和向海情感

倾向，是以维新为使命的知识分子。

在转变为维新知识分子期间及以后，梁启超在海洋学术和文化领域有大作为，在海权思想建构、海洋史地研究、华侨研究和海洋文学创作等方面卓有成就。梁启超所做的“维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学术文化建构促维新的知识涉及方方面面，再说他在知识创新上也不单单立足于维新，而且，他还是一个“传世”学者，这里仅略说与维新直接相关联的海洋学术文化。古代中国知识人极少研究海洋问题，中国海洋学术潮产生于晚清，从学术渊源看，西学是源头，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基本上是辑录而来的地理学读本。梁启超建构的海洋学术文化，则与明治维新期间的学术环境分不开。“梁启超通过东学吸收西学，但他并非简单的尾随者，既对某一学说有所取舍，又会从不同的学说中选择自认为合理的因素组合成新学说”（桑兵 2002：165）。梁启超接受的海权理论、黑格尔等人的人文地理学，来自于“东学”。他结合近代中国的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打造多个海洋新学说，如海陆联动论、“华侨殖民论”（李安山 1000）、“佛教最先从海路流入中国”学说（陈绪石 29）、海陆二元地理学思想等，著述有《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数十篇文章，其学术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的海国转型中亦起到一定作用，所以，研究梁启超建构的海洋学术文化有着突出的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梁启超建构的海洋学术文化”（项目编号：24FZSB05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宁波大学 2024 年人文社会科学高级别培育项目“人海关系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学研究”（项目编号：XPYQ240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Chen Xush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9035-1956>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佚名：《论太平洋上列国争竞大势》，《外交报》第 3 卷第 9 期（1903 年）：2-4。

[Anonymous. “On the Trend of Competition Among N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Diplomatic Review*, vol. 3, no. 9, 1903, pp. 2-4.]

陈绪石：《梁启超的海洋交通史研究》，《五邑大学学报》第 2 期（2025 年）：25-29。

[Chen, Xushi. “Liang Qichao’s Research on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History.”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no. 2, 2025, pp. 25-29.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1513.2025.02.004>]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Ding, Wenjiang and Zhao Fengtian.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iang Qichao*.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83.]

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张勇评议，高莹莹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Hazama, Naoyuki. *Liang Qichao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Rev. Zhang Yong. Trans. Gao Yingying,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2016.]

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人文杂志》第 1 期（1999 年）：112-117。

[Huang, Minlan. “Liang Qichao: The First Chinese Intellectual.” *Humanities Magazine*, no. 1, 1999, pp. 112-117.

DOI: <https://doi.org/10.15895/j.cnki.rwzz.1999.01.026>]

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编辑委员会：《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97-1036。

[Li, Anshan.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 *Encyclopedia of Overseas Chinese: General Volume*. Ed. Editorial Committee of Encyclopedia of Overseas Chinese: General Volume. Beijing: China Overseas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2002, pp. 997-1036.]

历樵：《英美日三国海权的竞争》，《海军杂志》第6卷第7期（1934年）：1-8。

[Li, Qiao. "The Competition for Sea Power Among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Naval Magazine*, vol. 6, no. 7, 1934, pp. 1-8.]

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2004年）：157-169。

[Li, Yi.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1, 2004, pp. 157-168.]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

[Liang, Qichao.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Ed. Zhang Pinx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9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孙立坚、孙丕强、樊瑞庆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Sun Lijian, Sun Piqiang, and Fan Ruiqing.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小谷哲男：《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地缘政治与海洋战略》，修斌主编：《海大日本研究》（第二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2年，40-48。

[Ohtani, Tetsuo.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Geopolitics and Maritime Strategy." *Japanese studies a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Vol. 2. Ed. Xiu Bin. China Ocean UP, 2012, pp. 40-48.]

桑兵：《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评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历史研究》第6期（2002年）：160-166。

[Sang, Bing. "Liang Qichao's Eastern Learning, Western Learning, and New Learning: A Review of Naomi Seki's *Liang Qichao, Meiji Japan, and the West*." *Historical Research*, no. 6, 2002, pp. 160-166.]

——：《晚清民国知识人的知识》，《学术研究》第1期（2020年）：110-123。

[---. "The Knowledge of Intellectual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Academic Research*, no. 1, 2020, pp. 110-123.]

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品性与特色——百卷本《中国全史》总序》，李健民、柴晓明编：《中国全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Shi, Zhongwen, and Hu Xiaolin. "The Character and Feature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 General Preface to the Hundred-Volume *A Complete History of China*." *A Complet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Ed. Li Jianmin and Chai Xiaom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Shinobu, Nobuo.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II*. Trans. Zhou Qiqia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2.]

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

[Wang, Xiaoqiu. *Modern China and Japan: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Kunlun Press, 2005.]

夏晓虹：《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导论之一》，《云梦学刊》第5期（2008年）：5-10。

[Xia, Xiaohong. "Liang Qichao as a Politician: An Introduction to 'Studies on Liang Qichao'." *Yunmeng Academic Journal*, no.

5, 2008, pp. 5–10.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6365.2008.05.001>]

许纪霖：《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视野中的南北文化》，《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2018年）：111–122。

[Xu, Jil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gricultural, Nomadic, and Maritime Civilizations.” *Intellectuals Forum*, vol. 15, 2018, pp. 111–122.]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近代史研究》第3期（2010年）：73–90。

[---.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ew: The Scholar-Official Consciousnes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o. 3, 2010, pp. 73–90.]

伊文成、马家骏：《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

[Yi, Wencheng, and Ma Jiajun. *A History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87.]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Zheng, Kuangmin. *The Eastern Learning Background of Liang Qichao's Enlightenment Thought*.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周佳荣：《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思潮》，《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1990年）：68–77。

[Zhou, Jiarong. “Liang Qichao and the Meiji Thought in Japan.”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2, 1990, pp. 68–77. DOI: <https://doi.org/10.13613/j.cnki.qhdz.000190>]